

# 二十世纪《楚辞》英译方向性及其影响考察

李慧君, 刘韧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翻译方向性是译本接受程度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探究《楚辞》英译方向性与译本接受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提出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双向交流, 实现从一厢情愿的译出或者译入向二者结合的良性合作转变, 达到中国经典文化真正“走出去”。

**[关键词]** 二十世纪《楚辞》英译; 翻译方向性; 译本接受; 文化传播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8.04.029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4-083-03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关照和诸多项目推动下, 中国文化经典外译与出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随之而来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经典的品牌文化传播效果。这一议题诸多学者见仁见智, 从翻译策略、翻译主体、翻译技巧、读者接受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通过从《楚辞》翻译方向性的角度, 探究翻译方向性与读者接受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 为中国文化经典“走出去”提供启示。

## 一、二十世纪《楚辞》英译概览

《楚辞》作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国内的楚辞学研究早已成为显学, 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研究专著。《楚辞》外译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几十个译本在流传, 楚辞英译研究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1895年,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发表《〈离骚〉及其作者》, 标志着英语世界屈原专门性研究的开始<sup>[1]</sup>。此后, 各国学者和译者开始了对屈原作品的离散式译介。截止2017年, 《楚辞》已有39个英文选译本和1个英文全译本。二十世纪出现的英译本主要有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全译本,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选译本, 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选译本、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选译本, 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选译本、林文庆(1935)选译本、杨宪益(1953)选译本、许渊冲(1994)选译本、孙大雨(1966)选译本等。

《楚辞》英译研究在二十世纪有诸多著述, 如王宏、林宗豪(2018)统计了最近三十年《楚辞》英译的研究成果, 提出展开目标受众的深度调查, 推动《楚辞》英译研究的深入发展。郭晓春(2015)探究了目前《楚辞》传播的困境和出路。张丽丽

(2015)考察了翻译方向对不同文化译作生成和接受的影响, 提出了文化经典走出去的建议。郭薇(2018)等认为翻译方向决定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 极大影响译本的文化传播效果。

## 二、《楚辞》英译方向性的差异及其影响

纵观二十世纪《楚辞》英译史, 众多译本生成的年代前后有别, 选择的篇目多少不一, 译本影响和接受程度也大不相同, 造成种种差异的原因不一而足。翻译方向性从目的、策略、动机、译本接受等诸多方面影响译本的接受程度, 是译本考察的重要因素。《楚辞》英译本在翻译方向性上有两个归属: 译入或者译出。Lonsdale(2004/1998:63-64)界定“翻译研究中的方向性是指译者是从外语向母语, 还是从母语向外语进行翻译”。Campbell(1998:57)认为“有理由相信具有完美双向语言能力的人很少, 因此所有的翻译活动可以划分为译出和译入两类”<sup>[2]</sup>。从外语向母语翻译在方向性上属于译入, 从母语向外语翻译属于译出。以上译本中属于译入的主要是国外译者或者汉学家: 如霍克斯、韦利、翟思理、佩恩、沃森等, 他们的译本从外语译入母语; 属于译出的主要是如国内译者杨宪益, 林文庆, 许渊冲, 孙大雨等, 他们的译本从母语译出到外语。下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杨宪益译本(杨译)和霍克斯译本(霍译)为例对《楚辞》英译的方向性和接受加以分析。

杨译与霍译在历史背景、成书年代、译者水平等方面很相似。杨译和霍译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二战结束后各国经济文化缓慢复苏。1953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楚辞》杨宪益英译本《Li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 u Yuan》单行本, 2001年外文出版社再版汉英对照的《楚辞选》(经典的回声)(Selected Elegies of the State of Chu), 2016

**[投稿日期]** 2018-07-10

**[基金项目]** 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16C0662); 2017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 17YBA163); 2018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编号: XSP18YBC115)

**[作者简介]** 李慧君(1978-), 女, 湖南益阳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研究。

年外文出版社再版汉英对照《楚辞选: 汉英对照》(中国经典外文读库)(Selected Elegies of the State of Chu)。这是杨译本成书出版概况。1959年,霍克斯英译本由牛津大学伦敦出版社出版《Ch' u Tz' u: The Song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楚辞: 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1985年企鹅出版社再版霍克斯修改后的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f Poems by QuYuan and Other Poets(《南方之歌: 屈原及中国古代其他诗人诗歌选集》)。这是霍译本成书出版概况。两个译本最初出版成书的时间相隔6年,两位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环境相似,翻译的功力不相上下<sup>[3]</sup>。

杨译和霍译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但翻译方向性不同,杨译属于译出,霍译属于译入,两个译本在翻译目的和译本接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杨译以忠实通顺为主,辅以适当归化处理。如《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杨译为:“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sup>[4]</sup>。“摄提”原为古代岁星纪年法的十二辰之一,相当于干支纪年法当中的寅年。杨译为sirius,译文没有其它注释和说明,保持了译文的简洁通顺,但译文读者要想真正理解此句,需要花一番功夫去查阅和了解文化背景知识。后句中“庚寅”为楚民间习俗上的吉宜日,古有男命起寅的传说。杨译“庚寅”直接用了“Tiger”,借用了中国古纪年法中的“寅虎”指代这一吉日,这对于没有中文基础的读者而言有一定挑战性。而对《离骚》的韵法,杨译采用了英语读者熟悉的英雄双面体处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霍译属于译入,他的翻译目的比较明确,就是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分享他热爱的中国古典文学,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较少<sup>[5]</sup>。

在读者接受程度上,杨译和霍译存在较大的差异。霍克斯的《楚辞》译本切合原文不拘泥于字句,被奉为西方世界《楚辞》英译的范本,它对不熟悉中国文学的英语读者帮助很大,对楚辞的推广流传有极大意义。1959年霍译《楚辞: 南方之歌》正式出版,加拿大汉学家杜百胜从译作书名、全译本意义、所含内容、所用技巧、译作艺术与汉学价值等方面高度评介了霍克斯的《楚辞》译本,他认为霍克斯“以其对一部重要作品的翻译延续了牛津卓越的汉学传统”,肯定霍克斯全译《楚辞》的功劳,认为译作既可为一般读者欣赏,也可用于专业学者学习。众多西方汉学家和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

大多征引霍克斯的《楚辞》译本,他的译本获得了普遍青睐与信任。在亚马逊上,霍克斯译本位列进口原版文学书热销排名第20位。反观杨译,杨宪益夫妇其译本至今仍藏于伦敦大学等欧洲大学的图书馆。他数十载如一日不计得失埋头苦译,在国内学术界获得好评。但在亚马逊上,《楚辞》英译本《Li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 u Yuan》销售量和读者评价均为零,与霍译反差较大。译本如果没有得到标的读者的广泛接受,就无法实现其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那么译本本身的价值和它出版的意义也将受到质疑<sup>[6]</sup>。《楚辞》等中国经典“走出去”是中西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本土译者译出,西方汉学家译入,本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都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互动,但不同的读者和文化体现出了不同的选择和态度。

### 三、《楚辞》英译方向性考察对中国经典“走出去”的启示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译入”和“译出”两种翻译方向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翻译方向性直接影响翻译目的与读者接受,是译本考察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格局中,模式化的单一翻译方向不可能满足所有翻译需求,应该鼓励中国经典英译方向多样化。从翻译方向性着眼,考察译本的译介实效,重视读者共鸣,力争实现读者的主动接受,有助于中国经典以品牌姿态“走出去”,获得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sup>[6]</sup>。

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译入和译出各有优势。纵览文学文化史,很多读者接受程度较高的文学翻译是译入翻译。最早的南北朝时期,北天竺菩提流支将汉籍佛经译成梵文。东汉的佛经翻译时期,当时汉朝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外国译者译入为主,译本的读者接受程度较高<sup>[7]</sup>。各国汉学家对《楚辞》译介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大多数读者是通过他们接受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经典译介较合理的方式是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双向交流,实现从“一厢情愿”地译出或者译入向“你情我愿”二者结合转变。中国译者对原作的准确深刻理解与国外汉学家的天然语言优势结合,这种合作翻译模式在一些翻译实践中被证明效果较好,值得借鉴和推广。

中国经典外译要有明确的读者定位。以标的读者的文化体系为参照,这样译作才能引起共鸣,实现读者的主动接受,优化文化传播的效果。评判经典译作不能只停留于文字表面,文化交流的过程、

读者接受的程度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都应考虑在内。戴乃迭女士曾坦言“我们是为看不见的人民做翻译…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这对译本在接受无疑有不利的影响,在译介过程中译者“心中有读者”往往能收获较好的译介效果。在中国经典主动走出去的同时,也应当让更多西方读者走进来亲历中国历史与文化,扫除文化交流中的障碍。中国经典应当构建有弹性的多译本体系,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实现文化的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让中国经典走上品牌传播的道路。

中国经典要“走出去”,还应当加强各出版界和各种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推进中国经典的海外译介和出版,拓展中国经典传播的海外研学基地。中国经典外译可以借鉴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合作的模式,政府主要负责审核监督,个人(中外译者、学者)合作作为主要方式,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的积极作用,团结各国汉学家、各类出版商、中间商和留学生等,合理利用多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为中国经典“走出去”更好地服务。

《关于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议“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大政方针,更是一个

系统性的大工程,以经典品牌为龙头,以中国元素为特色,国内外各种力量积极参与,“走出去”涉及的各方代表加强沟通,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地“走出去”,中西方文化才能真正地实现双向交流和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 [1] 魏家海. 《楚辞》英译及其研究述评[J]. 民族翻译, 2014(1): 89-96.
- [2] 黄立波. 译出还是译入: 翻译方向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考察[J]. 外语教学, 2011(2): 96-101.
- [3] 李慧君. 论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96-98.
- [4] 屈原著; 杨宪益, 戴乃迭译. 楚辞选: 汉英对照 (Selected Elegies of the State of Chu)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6: 2-3.
- [5] David Hawk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22.
- [6] 许多, 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 13-17+94.
- [7] 李慧君. 中国典籍译介逆差的平衡研究[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5(4): 96-10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A research on the direction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u Ci* and their influences

LI Hui-jun, LIU Re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direction is a vital working factor to acceptabil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capacity of translated works.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direction and acceptabil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capacity of translated works, proposes that classic translation should enhance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ransfer from the present uni-direction transla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ranslation directions to adva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ome advices are provided for the glob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strategy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u Ci*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ranslation direction;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ed works; cultural transmission